

领导干部自律典范

——重读周恩来《过好“五关”》

□ 王恩宝

《过好“五关”》是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。他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自觉过好思想、政治、社会、亲属和生活“五关”，并且提出过好“五关”的方法；强调过“五关”是长期的，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一步一步地过好“五关”。关于过“五关”问题，周恩来还多次对知识分子、民主人士和亲属讲过。重温这篇经典文献，不仅具有深远历史意义，而且对于新时代领导干部坚持自我改造具有重要启示。

过思想关 “一直改造到老”

周恩来指出，过思想关就是思想改造，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，也就是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worldview 和人生观，学会运用毛泽东实践论、矛盾论以及认识论。

周恩来强调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思想改造问题。提出思想改造“是一辈子的事”。“时代是不断前进的，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，跟得上时代，时时前进。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，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。”“一万年以后，在人们的头脑里，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，新和旧的矛盾，个人和集体的矛盾，还会有思想改造的问题。”不能说思想改造到一个节点就完成了。“即使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，如果忽视了改造，革命意志衰退了，还是要落伍的。”他说，“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无止境的工作”“我们永远不能满足”。

周恩来进一步指出，过思想关不仅要联系自身实际，还要联系工作环境。跟外国人打交道或者做外贸工作，要认真研究接触的人和事。他自己现身说法，讲道：“历史上我做过统一战线工作，跟蒋介石打过多次交道，跟美国的马歇尔也打过交道，在台湾有那么多的国民党同学和朋友，在美国也有很多朋友，我的关系可复杂了。从周围的环境看，我接触党内外的人和事很多，也接触外国人，有时候要出国访问，还到资本主义国家，跟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。这么一个复杂的情况，我就得注意自己的思想。”

周恩来特别强调自身的思想改造并且要率先垂范。他指出：“我今年65岁了，是不是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

改造了？我不敢这样说。廖鲁言同志用了我的话，他说，周总理都要思想改造，何况我们？他的这句话是句好话，我很欣赏。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，现在还在改造中。我愿意带头。”“我希望大家承认思想改造的重要性。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。要经常反省，与同志们交换意见，经常‘洗澡’。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，非有不可。不然，你的思想就会生锈，就会受到腐蚀。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，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：准备改造思想，一直改造到老。”

过政治关 “认真对待立场问题”

周恩来指出：“过政治关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。”“不要以为我们是干革命的，立场就一定是稳的。”他辩证地分析道：“立场是抽象的，要在具体斗争中才能看出你的立场站得稳不稳。”“可能在这个斗争中站得稳，在那个斗争中又站不稳了。所以，立场究竟稳不稳，一定要在长期斗争中才能考验出来。”

周恩来强调必须全面地看待过政治关问题。他认为，除了立场问题，同时还要看工作态度、政策水平、群众关系，看党性。“特别是看我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，是不是知过能改”。

周恩来辩证地分析道：“过政治关不是简单的事，不能认为只要参加了革命，打了多少年的仗，过去有过功绩，立场就可以保险了。没有这样的事。”“我们要认真对待立场问题，过好政治关。”

过社会关 “要有长期奋斗的决心”

周恩来指出，中国社会极其复杂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，很容易影响你、沾染你、侵蚀你，如果失去警惕，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。因此，“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任务”，并且“改造社会的任务是艰巨的，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”。

周恩来进一步指出，改造社会是长期的任务。“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不是一下子就会消除的，改造是长期的。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于各个角落里，各种机关团体都有”。因此，“过

社会关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”。

周恩来认为，改造社会、改造自身是相互影响的长期过程。他指出：“你能把社会改造好，自己也就得到改造了。不然，是你影响它，还是它影响你？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中说，是资产阶级改造我们，还是我们改造资产阶级？这段副词说得对。你改造了它，它又影响了你，互相改造，这是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。而且，你在这个地方过好了社会关，换一个环境，那个地方的旧势力、旧习惯又影响你。你在国内过好了社会关，到了香港或是到外国去又变化了。所以过社会关要有精神准备，要有长期奋斗的決心。”

过亲属关 “做出一点表率来”

周恩来郑重提出：“对亲属，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？”“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解决得不好，你不能影响他，他倒可能影响你。”

周恩来提出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：主要是依靠社会，由社会去锻炼他、改造他。要相信社会的力量。

周恩来认为，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“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这么几口子。特别是干部子弟，到底是你影响他，还是他影响你？这个问题十分重要。”他呼吁领导干部：“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，不要造出一批少爷。”他严肃指出：“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，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。对于干部子弟，要求高、责备严是应该的，这样有好处，可以督促他们进步。”

过生活关 培养美德、提升境界

周恩来指出，对于物质生活，“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，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，甚至于过了，觉得少一点好，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。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。这样，我们就会心情舒畅，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，给集体增加福利，为国家增加积累，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。”

周恩来认为，精神生活方面，领导干部“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，以人民的疾苦为忧，以世

界的前途为念。这样，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，精神境界就会高尚。”同时，他也反对片面性：“我们不是说一天到晚只搞政治斗争，只干工作。人的生活要丰富一点，精神更要舒畅一点。文艺生活总是要有的。”他特别强调文艺生活要有教育意义，“文艺生活是为了活跃人的思想，提高人的修养，把教育寓于文化娱乐之中”；要坚决批判、反对庸俗低级的、野蛮恐怖的、堕落腐化的东西——“这些东西不仅对我们不利，对青年一代的成长更为不利”。他鲜明指出：“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文艺思潮和文艺作品是颓废的没落的，决不能让这些糟粕影响我们的干部，影响我们的青年一代。我们要在这方面加以整顿。”

当前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入了新时代。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、改革开放考验、市场经济考验、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、复杂的，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、能力不足危险、脱离群众危险、消极腐败危险非常尖锐和严峻。对于领导干部来说，诱惑多面、考验不断、关口重重。为了出色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、交给党和人民以圆满答卷，领导干部必须加强自我修养、自我锻造、自我革命，击退诱惑、战胜考验、冲破关口。为此，必须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，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在政治立场、政治方向、政治原则、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，把对党忠诚、为党分忧、为党尽职、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，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；必须牢记党的宗旨，挺直共产党人精神脊梁，把牢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的“总开关”；必须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，严守廉洁纪律、群众纪律、工作纪律、生活纪律，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底线；必须加强学习、善于学习，坚持战略思维、历史思维、辩证思维、创新思维、法治思维、底线思维，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，勇于战胜风险、挑战，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局面。

重读经典



甲骨文是殷人“刀笔”于兽骨、龟甲等材料之上的古文字，被称为“绝好的史料”。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，开启了埋藏于“断烂朝服”中殷商历史研究的新征程，它与敦煌文书、西域汉晋简牍、清内閣大库明清档案一起，被誉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的“四大发现”，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轰动。甲骨文的发掘与研究诞生了甲骨学，在甲骨学的早期研究历程中，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，有孟广惠、王襄、王懿荣、刘鹗、孙诒让等，其中近代学者罗振玉（号雪堂）、王国维（号观堂）、郭沫若（字鼎堂）、董作宾（字彦堂）起了奠基性和开创性的作用，被钱玄同称为“甲骨四堂”。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评价“甲骨四堂”对甲骨学研究的贡献曰“自雪堂导夫先路，观堂继以考史，彦堂区其时代，鼎堂发其辞例，固已极一时之盛”。

“甲骨四堂”学术成就斐然，虽然他们研究方向有所差异、研究方法各具特色，但他们核心的治学理念是“实事求是”思想，即治学需朴实严谨的思维与科学创新的精神相结合，是

“甲骨四堂”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

□ 李红姗 刘志涛

历史的逻辑与科学的态度相融合。朴实严谨思维是“实事求是”的基本内涵，科学创新精神是“实事求是”的应有之义。我们从“甲骨四堂”在甲骨学领域的成就就可窥一斑。

雪堂罗振玉——功夫统一，朴实严谨，化“骨”成“文”。罗振玉自幼喜读经史，钻研碑版考证之学。他在青年时期就已经积累了深厚的学问基础，无论研究方法如何多样，最终都要复归于踏实、纯粹的治学功夫，用心如一，做到“论必有据，据必可信”，万不得存任何侥幸心理，这些特质为他后来的治学研究创造了有力支撑。罗振玉是第一个正确判定甲骨文出土遗址在安阳的学者，这一点在他1915年刊印的《殷虚书契考释》有说明，最重要的是在本书中，他考释了大量甲骨文字，使卜辞基本可以解读。他灵敏的学术嗅觉促使他多方采购、搜集、收藏了大量的甲骨，经过系统整理，精心筛选，潜心编纂，前后出版了藏品著录《殷虚书契前编》、《殷虚书契后编》《殷虚书契续编》及《殷虚书契菁华》，这些著作推动了整个甲骨学界的发展。为王国维、郭沫若等后续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源头资料与研究路径。此外，他还参与了西北敦煌流沙坠简、鸣沙石室文献、清内閣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研究工作。罗振玉的成就之高与功夫之深不必多

言，简而言之，甲骨在他人之手是“龙骨”，在罗振玉之手可称之为甲骨“文”，他推动了甲骨文研究向甲骨文献史料期转变。

观堂王国维——阙疑求是，贯通中西，辨“骨”分“史”。1925年，王国维作《古史新证》，总结出新的研究方法，即“二重证据法”。陈寅恪在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中将其精义概括为“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……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……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……此先生之遗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”。事实上，王国维在其早期研究过程中已经开始使用这种研究方法。早年他跟随日本学士藤田丰八、田冈佐代治学习外语、数理知识、哲学等西学知识，促使他的思维结构逐渐突破传统考据学的局限性，走向了科学实证思维。1911年他迁居日本，帮助罗振玉整理甲骨材料，并与日本甲骨文研究者产生多次思想碰撞。王国维把考释甲骨文作为研究商代历史的史料，以甲骨卜辞为据，与其他古文獻相印证，辨析梳理了《史记·殷本纪》的商代王系，考定了殷先公先王，还厘清了史料记载的一些错误，譬如，他在《续考》中，纠正了《史记》以报丁、报乙、报丙为序的错误。“二重证据法”的形成，推进了甲

骨学科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进程，深刻地体现了王国维的阙疑求是精神，“阙疑”是一种问题意识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“求是”的过程。正如朱子在《朱子语类·读书法下》中所言：“读书无疑者，须教有疑；有疑者，却要无疑，到这里方是长进。”王国维提倡学术独立自由，主张开阔视野、融汇创新，学无新旧、学无古今、学无中外，不轻易疑古，不迷信古籍，所以更易于突破现有的各种研究范式，形成更恰当、更趋近甚至获得真理的研究道路。

彦堂董作宾——调查研究，思维严密，划“骨”断“代”。科学研究是以充分地实践调查为前提，而董作宾的甲骨学是建立在长期从事殷墟甲骨发掘的实践基础之上，这也是区别于其他三位学者最明显的地方。1928年董作宾受命到安阳调查殷墟甲骨，他得出“甲骨挖掘确实之未尽”的结论。为了拯救“吾国古代文化至巨之宝”，董作宾开展了殷墟甲骨第一次发掘工作，“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”，截止到1937年，前后对殷墟甲骨共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。董作宾积极参与了每一次发掘，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他勤于考古发掘前线，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，发现了甲骨文例与贞卜规律。1933年，董作宾在《大龟四版考释》的基础上发表了《甲

骨文断代研究例》，创立了科学而缜密的甲骨文断代体系，即“十项标准”和“五期”说，把甲骨文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，提纲挈领地建立起甲骨学体系。此外，他对甲骨文例的研究丰富了甲骨文史料价值，是殷商历法的先驱者。郭沫若曾评价说：“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。”

鼎堂郭沫若——兼收并蓄，创新方法，纂“骨”辞例。1928年，郭沫若因政治原因被迫流亡日本，为了解决编写古代历史文章缺乏材料实证的问题，郭沫若开始研究甲骨文。他积极吸收“罗王之学”的研究成果，主张“目验既多而心犀自启”。因此遍访流入日本东京的甲骨，从日本文求堂辗转到东洋文库、上野博物馆等地，并到京都搜罗拓片，最后在日本友人、国内学者董作宾等的帮助下于1933年印刷发行了他的新著《卜辞总纂》，该书在卜辞整理编排上划分了八类并作相应的考释，创新编著体例、资料翔实，把卜辞各项内容科学分编，减少了读者因不明辞例而产生的诸多错误，是“综合研究甲骨文最成规模的一部书”。此外，郭沫若还著有《甲骨文字研究》《殷契粹编》等甲骨文研究成果，他考释了一批甲骨新字，纠正了一些罗振玉、王国维的甲骨错释，在甲骨释读方面开创了“断片缀合”“残辞互足”研究方法，丰富

让信仰根植理性 让人生充满意义

——读《中央党校学习笔记》

□ 董振华

羊城晚报社副社长李宜航撰写出版了《中央党校学习笔记》。通读全书，我从中看到了思想的威力，谈出了党校理论教育的价值，也触摸到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心路修炼之旅，更是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党校教员沉甸甸的使命与责任，那就是要让信仰根植理性，让人生充满意义。

本书呈现了共产党人伟大的灵魂，有“高度”。人的生命必须在意义中走向神圣。对于共产党人来说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在造福人民的奋斗和实践中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：“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，那么，重担就不能把我们所压倒，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。”崇高的心灵和伟大的人生不是天定的，而是不断修炼出来的。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，党校可谓灵魂修炼的神圣殿堂，在这里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。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：“入学的第一天，我给自己这样的解释：我要低到尘埃里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悄悄地寻找共产党人的‘精神密码’；我要化为一滴水，在奔腾的长河之中，溯源共产党人的‘灵魂家园’；我要做一枚安静的行者，踏访通往中国梦的基因谱和路线图……我想回到初心，回到举起右手那一刻的思考：我们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？”

本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，有“深度”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要真懂，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“以理服人”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，“理论上不彻底，就难以服人”。只有抓住了事物本质的有“深度”的理论，才能够抓住人的灵魂。党校就是一个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，为伟大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提供理性基础的神圣家园。正如作者所说：中央党校作为我们党的最高学府，要为党的重大创新理论提供学理支撑、分析范式，就必须找得准学术接口、讲得明逻辑起点、理得清哲学维度、守得牢立论基础，能让学员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，搭得稳“四梁八柱”。正是基于这样对真理的渴望和对崇高的追求，他在中央党校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坚定信仰的理论

了甲骨文卜辞研究的内容，开拓了甲骨文研究视野。

崇尚“实事求是”的治学理念是“甲骨四堂”最鲜明的特质。“甲骨四堂”每位学者的治学特点并不局限于上述所言，每个人都拥有丰富的治学风格，他们“多闻阙疑”、刻苦钻研、视野开阔、融会贯通、思维严密，治学具有前瞻性、预见性。从学术史的角度看，“甲骨四堂”明显受到清初“乾嘉学派”的朴实考证学风的影响，并把这种“朴学”的特点充分发挥在自己的治学研究中，同时他们一直把科学创新的精神贯穿于治学研究的始终，既注重“求实”又竭力“求是”，敢于打破传统思维枷锁，创新研究途径，开辟了治学新道路。

反观当下治学现状，存在学风浮躁、急于求成、学术“工匠精神”缺失等不良现象。看似是治学问题，实际上是思想意识问题，治学不仅仅是做学问，治学的最终境界是导向人生境界，从这方面来说，“甲骨四堂”以身垂范，他们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足可供后之学者瞻摩。正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所言：“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：‘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’。此第一境也。‘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’。此第二境也。‘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’。此第三境也。”这是读书治学三境界，亦是人生三境界，望诸君有所借鉴。

